

● 李 济 著

考古琐谈



湖北教育出版社

考古琐谈

李 济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琐谈/李济著;李光漠整理.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ISBN 7-5351-2151-9

I. 考… II. ①李… ②李… III. 考古-文集
IV.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703 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583043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解放大道 145 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6 插页 9.75 印张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9 千字

印数: 1—1 500

ISBN 7-5351-2151-9/K·64

定价: 14.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序

钟祥李光谟先生日前来台,参加此地五个学术机构庆祝他先尊李济先生百岁诞辰一连串的活动。刚一见面,李先生便很高兴地跟我说,他的家乡湖北省的一个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一本李济先生的考古文字选集,命我写序。李济先生是我的恩师,我的母亲又是黄陂人,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北人。光谟先生给我这个向我的同乡(至少是半个同乡)说说有关我的先师钟祥李济之先生的话的机会,是十分使我感激的。

一八九六年诞生、一九七九年逝世的李济先生在今日的大陆上知道的人可能不很多,但是考古学者没有不知道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的。今天的湖北,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以前,除了地面上的古迹以外,湖北还是考古学的处女地。不但湖北,全国各省都没有听说过考古学这门学问。一九二零年,瑞典的地质学者安特生博士(Dr. J. G. Andersson)先后发现了河南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和在北京西偏南的房山县周口店的附近前所未见的石英(后者表示远古时代有人的存在),后来导致黄河流域的仰韶彩陶文化和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北京人的发现。一九二三年,李济先生完成了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博士论文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译本名为“中国民族的形成”)。回国以后,他先在天津

的南开大学,后在北京的清华学校教书,到一九二八年应蔡元培与傅斯年两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三组考古组的主任。

李先生回国后的第一件考古工作是河南新郑的发掘;这次发掘结果不很理想。但下一件的工作则是大大的成功,即是一九二六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国人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的史前遗址,也是第一次国人与外国机构合作考古计划,它为嗣后中外合作的考古计划提供了模范。一九二八年以后,李济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上,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且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础。

在李济先生将科学考古引进中国七十年后的今日,湖北已经由处女地的地位升到全国考古发现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了。最早的人类活动有郧县和巫山的直立猿人代表。全国最早的稻米已在长江中游的邻省湖南和江西大量发现,相信在湖北的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青龙泉上层文化,在湖北都有广泛的分布。在三代考古上,商和西周时代的重要遗址在湖北都有重要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楚文明的大量而且极端重要的发现。除了江陵郢城的调查之外,从江陵和荆门出土的楚墓中还发现了无数的楚国工艺品,如漆器、木雕、玉器、丝绸等等,不一而足。但更为重要的是楚墓中的文字简牍,有五经中的易、国语中的楚语。这两本书都是传世书籍中最早的写本,可惜都是从盗墓贼那里买来的,不知它们出于何处,何墓。近年来香港古物走私市场充满了还用湿泥包起来的

“楚简”，似乎都是从荆门来的；家乡的文物工作和保护文物工作者恐怕需要加倍的努力。

李济先生虽然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可以说对今天湖北省文物工作的伟大收获也尽了他的力量，他如果在世一定对已有的成果感到骄傲，但对将来的湖北考古探讨必然有更大的兴趣。去年国家文物局长张德勤先生访台时，曾经公开正式邀请台湾的考古学者派遣一个工作队到三峡去参加为了三峡水库的建造所做的抢救考古工作。今晨（九月十日）阅报载：“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的主体工程已开始动工，而随着工程的进展，位于三峡库区的文物古迹搬迁抢救工作，速度却明显落后。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向民间发出呼吁，支持三峡大坝的文物抢救保护。”三峡抢救考古工作大半是要在湖北地区进行的。我希望台湾的考古学者能够很快地组队前往湖北，参加三峡文物的抢救工作。台湾的考古学者从广义来说，当然都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后代；但他们更多是李济先生亲手创办扶育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现称人类学系）出身的。李济先生身后有一支他的直系子孙在他的家乡接续他的终身工作，保护他的家乡的文物，可说是这项专业中的美事。不消说，如果我的健康允许，我也一定参加这支队伍的。这本书的内容，可以使读者们了解李济先生本人以及他在台湾训练出来的这支考古队伍对考古这门学问的态度和看法，相信读者们自己也可以从里面学到李先生的考古精华。

张光直敬志

1995年9月10日

李济先生百年诞辰志语——代序

这一期《中国文化》(指第十三期。——本书编者)发表了二十至三十年代殷墟出土珍品之照片八帧(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以纪念当年主持发掘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济之)先生百岁冥诞。杂志主编命我撰文介绍先父济之先生生平,兹不揣浅陋写下几段,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李济先生,湖北钟祥人。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晚年兼任所长多年),并筹备一所现代国家博物院达十余年。先生一生治学以研究中国民族文化为宗旨,凡地下实物之发掘整理,皆运用科学方法、依据人类进化学理加以贯通;造论精确,为中外学者称许。先生领导田野工作,以西阴、城子崖及殷墟之发掘最著,尤以殷墟十五次发掘之成绩,获世界学术界极大重视。中国之有现代考古学自先生始。迁台湾后,先生创考古人类学系于台大。数十年来培育人材甚众,内中享誉世界者多人。

先生治学勤苦,每所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研,而论著之写作,入深出浅,琅琅上口。毕生发表专著十数种,论文百五十余篇,皆重科学之实证,拒斥无根据之推测及臆断。中国信史得以上推六七百年之结论,实有赖先生一辈考古家之劳作。

先生主编之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之学者所必读。晚年并担任中国上古史文集之主编,惜未得见全功之毕。先生为开拓建立现代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尽心竭力,其夙愿为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之正确认识,提高中国考古学之水平及世界地位。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先生以心疾猝发病逝于台北寓所,享年八十有四。

先生留予后人之尤可宝贵之遗产,为其治学精神及人品。(一)培养学生,最重基础课及基本训练:亲授大一入门课程,指导田野测绘、照相、记录、整治实物,传授粘合与拓揭技术,示范区别体毛、处置人骨及其他等等,以使學生掌握科学方法,领会如何将考古人类学建成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精密准确之科学。(二)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修养及实证科学态度,在古史研究方面提出四种境界之观点(详见本集《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所作之介绍),指出认识科学真理为一条艰难道理,需有正确之得失观,具备职业上之胆识,有不畏艰辛、甘冒天下大不韪之精神。(三)极富个性又最为难能者,是先生一生考古,但从不收藏古物。自二十年代末领导殷墟发掘伊始,即向全体同事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公家,考古组同仁自身绝不收藏古物。先生对此身体力行,清标自守,终生不渝。在后人看来,此项原则决不仅仅为个人操守风范问题,实为考古学史上值得大书之开创性举动,划时代标志。它不仅冒犯历来考古家无不收藏珍品此一古今中外之“天经地义”,且成为将科学探求与无私贡献融为一体、将市场价值与真知标准断然区别之果敢宣示。史学大家劳榘先生称此为“百世不易之领导金针”,实为至论。多半世纪来,此一度人“金针”已为众多科学工作者认同,在大陆及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已日渐形成为一个传统。

以上仅就若干方面写下星星点点,难免挂一漏万。缅思先德,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再续。迄今大陆学界对先生所知仍不太多,愿他的治学精神垂范长久,惠及后学。

李光谟



李 济

一八九六——一九七九

目 次

序	张光直 1
李济先生百年诞辰志语 代序	李光谟 4
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手稿]	1
社会学 [手稿]	7
僵化 [手稿]	9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12
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作起	21
人之初	26
试谈治学方法	31
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	40
博物馆与科学教育	51
如何办科学馆?	56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 [节选]	59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73
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79
从人类学看文化	93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	112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	127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	138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	141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153
《中国上古史》编辑大旨·····	169
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	171
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 要性·····	177
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	189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	199
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	217
《古物保存法》颁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	238
敦煌学的今昔·····	241
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	246
牙的故事二则·····	251
史前考古学所研究的“人”和“自然环境”·····	255
“沧海桑田”的考古学例证之一·····	260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 理论纠纷(一)·····	266
魏敦瑞氏的“古今人表”之编制及其所引起的 理论纠纷(二)·····	272
李济先生学术活动简表·····	278
李济先生著述要目·····	285
编者后记·····	300

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

(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北京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上讲)

三年前我因为要分析组成现代中国民族的成分,写了一篇论文叫作《现代中国人民之体质》。^①在搜集关于这个题目的材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大事情,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有系统的材料已经印出来的是非常之少。那时我就发了一个大愿心:心想回国后我必定要测验几千几百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民国十二年,我初从美国回来,遇着了丁在君先生,就告诉了他这个意思,立时就得到了他十二分的赞许;他并且保险替我想法子使我能够遂一部分的愿心。那时候我尚不是正式的科学社的社员,然而因为得了丁先生的疏通,科学社就慨然允许我经济上相当的帮助;我的测验中国人民体质的工作因此就开始了。

* 先父李济(济之)先生这篇手稿,是今年一月间很意外地在他的遗稿中发现的;原稿用墨笔写在毛边稿纸上,涂改之处不多,字迹清晰,从文字上可以认定是供演讲用的。但是否最后定稿尚未敢言必。这份手稿说明,先生在归国后第二年(一九二四),继郑发福之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体质测量。遗稿的发现和整理,是在张光直兄为《考古琐谈》作序之后,可以对序中涉及的李济先生回国后初期的田野活动作一个重要补充;特别由于这篇稿子讨论的是有关湖北的科学问题,因此我把它补充进来作为本集的开篇。

文稿整理者 李光漠於一九九六年三月

今天的报告就是根据去年在湖北所测验的材料。我作这一件事情得了很多的公共机关及朋友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我要乘这机会申谢一番。科学社是我的主人,丁在君先生是我的第一个赞助人,没有这两方的帮助,这工作是根本上不能开始,所以在我的谢单上第一个机关是科学社,第一个朋友是丁在君先生。其次,南开大学及凌济东先生^①也是极力帮助我这工作的。南开大学非但准了我很长的假期,使我得作这一件事情,并且给我两百块钱使我能把由科学社所得的经费省出一部分,这种盛意都是我应该表谢的。我又(要)谢谢前武昌师范大学的校长张春霖先生及事务课长李廉方先生;因为他们调了好些他们学校的职员随时地帮助我,所以我能于十数日之内测验到一千人数。但是我最应该申谢的是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叔澄先生:他领我到学堂量学生,到工场量工人,到监狱量犯人,到警察署量警察。因为他的介绍,所以武昌有一千人肯为科学牺牲十几分钟个人的自由,让我摸头、摸脚、翻眼睛、揪耳朵,把他们的模型记载下来。此外还有好多朋友帮我,应该谢谢的我都一起谢谢,但是我不能一一尽说了。

就测验的本身讲,第一个问题是选哪几种体质的特征作测量的根据?人身有好几十处可以测验;要是处处都量到,在最适当的情形之下,最高的速率也是每人二十几分钟。所谓最适当的情形者,就是受测验的人须把衣服脱得精光,绝对地受(听从)测验人的指挥。这种情形除了在军队中依长官命令之外,差不多是很难得到,所以我在最初就没有作这种希望。我采取的手段(是)“少量几点,多量几个”。意思就是与其每人量十处、只量一百人,不如每人量一处、量一千个。因为从统计上多多益准的公例看去,一百个人十处测量的可靠的程度,一定比不上一千个人一处的测量的可靠的程度。十个较为不可靠的测验与一个较

为可靠的测验相较,还是取一个较为可靠的测验为经济。还有一层我们应该知道的:人身可以测量的地方虽很多,然而一多半都是因环境、因遗传而同时发生变化的,所以在研究人种学上的价值它们并不一样。总结以上种种的观察,我到湖北去测验的时候,我只选了十三个绝对的测验、二十三个观察的地方作我调查的根据,其中一多半是属于头部和面部的。由十三个绝对的测验,至少可以得五个相对的测验;结果是在我测验(的)一千人之中,每人可以由我形容的地方有四十五处。

有些朋友问,为什么先跑到湖北咧?有两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的计划原是想每省量一千人。十八省中总有一省我要第一去的。北方几省,有一个协和医学校的许大夫在我之先起首量了^③;南方太远,当然是到中部去。碰巧湖北是我的故乡,容易得相帮的人,容易接洽,所以就选了湖北。

我今天的报告是就这四十五个观察测量的地方选出三点来讨论:第一体高,第二头宽指数,第三鼻宽指数。在我详细讨论之先,我有一件事要请诸位注意:我这三个分配图各县的均数所根据的是极不一样。最多的是黄陂,这一县的我竟测验了一百十九个,而代表长阳、鹤峰各县的一个也没有。就先前的府分讲,一千个人之中有六百六十一个人是武昌、汉阳、黄州籍,只有三百多人是由其他的七府一州来的。

总这一千个湖北人讲,他们的体高的平均是一六五六毫米,头宽指数为八三·零三,鼻宽指数为七三·六零。

拿人种学的名词来形容湖北人,他们的体高为中平,头为圆形,鼻为中宽。这是单就一千人的均数讲。但是我们知道均数代表的数目的伸缩甚大,没有差别数作它的陪衬,它的内容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第二步工夫是就地理上分析它的内容。我们要知道在湖北境内的中国人口是不是具纯一的体质,亦只

有从这一步工夫入手。

先就体高讲：一千个人中最低的测量为一三七九毫米；最高的测量为一九四四毫米；两极的距离为五九六毫米。湖北的长子比湖北的矮子要高中国尺一尺七寸多。这里边的一个问题是：这长子矮子是不是生在一个地方？

考较各府的平均得以下的结果：

武昌	一六四一	汉阳	一六五九	黄州	一六六一
安陆	一六五三	荆门	一六六六	德安	一六五六
荆州	一六五六	襄阳	一六六八	郢阳	一六九二
宜昌	一六五二	施南	一六四八		

长江流域的体质较之汉水上游的人平均要矮三十个毫米。长江流域的人体高像湖南，像浙江；汉水上游的，近于河南、山东人的。中分的地方约在安陆、荆门、德安一带。就普通(遍)的趋势讲，湖北人的体高增高与地理上纬度的增高作正比例。

照同样的手(段)来分析头宽指数均数的内容，我们发现湖北虽是一个宽头省份，然而亦很有地域上的分别。简单讲，东南各县为圆头聚集的地方；这一方各县的均数多在八二以上，有高到八六的。同时，西北的头宽指数亦是很高。唯有安陆、荆门及襄阳与荆州的东部为稍低。所以，湖北头宽指数的分配在地图(上)呈一个“凹”字形：东西高、中间低。

再就鼻宽指数的分配讲，较之体高及头宽指数确又不同。东南部差别程度确没有什么高下，都在七零及七八之间；而西北一带由六零至九零各种指数皆具。一部分原因为所测的西北人数太少。然而不尽是因此。譬如，襄阳的人数为六十五，不能算少；荆州府所测的人数为五十六，不算多。然比较襄阳与荆州鼻宽指数的分配，荆州确像东南大部分的，极为整齐均匀；而襄阳却一如其他西北诸部，六零八零之间的鼻宽指数都为所具。

综以上三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第一件事我们想得到的:湖北东南部的人民与湖北西北部的人民体质上大有分别。东南部人矮、西北部人高,这是无可疑的了。不过东南、西北两部虽有高矮的分别,而头形又是相类。体高而头圆的湖北人是不是与体短而头圆的湖北人同属一派咧?我个人相信这个解释在鼻形分配图上求。

就历史上的趋势说,中国人民在中国以内的移动都是由西北向东南。永嘉、靖康两个大移动就是很好的证据。间或有向西北的,那是偶尔的政治现象,不是经济上自然的趋势。

我们要根据这个历史上的原则来解释湖北体质分配的现象,可以得一个暂时的或然试说:湖北的民族大概是由三个分支构成。最早的一支是体矮头圆而鼻宽,他们是遍布了湖北。以后由西北又来了一支头圆体高而鼻较窄。这一支方入湖北的时候,大概与原来的一支不十分相入,但是到了武、汉、黄一带与原来的一(支)渐渐混合起来;所以混合的结果集中在武、汉、黄一带,而西北一带反保存了原有的两支。最近的一支大概是头长鼻窄身高的。他们人数不多,入湖北以后就停留在中部居多。他们与原来的两支混合起来,就是安陆、荆门、襄阳及荆州东部的湖北人。

有了这一个解释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体质的分配解释了;这个在历史上亦可以找出一部分相当的证据。陕西的居民,因为由新疆来的土耳其民族^④的影响,一大半是体高而头长。这一部分人由汉水而入湖北是意想中事。唯有这体高头圆鼻扁的是代表何支,我尚不敢臆断。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湖北邻省的居民亦通体测量一番。

④此文即嗣后收入李济博士论文作为第二章的《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